

# 试论《最新整理校注本西游记》版本价值和英译意义

○王 镇<sup>1,2</sup>, 王晓英<sup>1</sup>

(1. 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2. 淮海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 江苏 连云港 222005)

[摘要]《西游记》是通过其各种英译本而将取经故事传播到英语世界的,但是由于人文本《西游记》存在大量的讹误问题,导致了不少负面的文化误读和文化误译结果。随着对人文本的勘误取得实质性成果以及《最新整理校注本西游记》的出版,《西游记》最新版为深入开展《西游记》的全球性译介提供良好的版本来源和文化基础,更好地服务于“中国文化走出去”这一国家战略。

[关键词]《西游记》;文化;误读;误译;《最新整理校注本西游记》

## 一、人文本《西游记》在国内外的广泛影响

### (一) 人文本《西游记》的积极影响

目前在中国和海外相关华人世界中通行的《西游记》版本是 1955 年和 1980 年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西游记》(以下简称人文本《西游记》),其余各家出版社发行的《西游记》也大多照搬人文本,同样备受读者的喜爱。

《西游记》是享誉全球的一部中国文学经典,西游故事在其正式成书之前就通过各种早期版本和各种外译本传播到英语世界。自 1895 年最早的《西游记》第 10-11 两回节译本由上海华北捷报社(N. C. Herald)出版以来,不断有新的英文节译本出现,使得“猴王”“唐三藏”和“西天取经”的故事在英语读者中有很高的认知度和普及度,英国大百科全书曾评价该书是“中国一部最珍贵的神

---

作者简介:王镇(1975—),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在读博士生,淮海工学院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和翻译研究;王晓英(1965—),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和翻译研究。

奇小说”。<sup>[1]</sup>可以说,《西游记》是四大名著中最早走向世界、拥有最多外国读者、国际文学影响力最大的一部。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本土的翻译家们对《西游记》全本的英译工作尚未涉足,在目前世界上仅有的两套英文全译本中,都是以人文本《西游记》为翻译底本,一个是英国汉学家詹纳尔(William John Francis Jenner)的四卷本 *Journey to the West*,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在上世纪90年代付印并发行于中国大陆,另一个是美国华裔学者余国藩(Anthony C. Yu)的四卷本 *The Journey to the West*,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在上世纪80年代完成刊行,该书于2011年又做了一定的修订,但未能进入中国大陆图书发行渠道。这两版英译本也得到了一定的认可,“詹纳尔版的优点是完整呈现了原著的风貌,但在准确性和艺术性方面有很多缺陷;最优秀的是余国藩版,它同样完整,对原文的解读十分精到,绝对是汉英文学翻译的典范之作”。<sup>[2]</sup>

## (二)人文本《西游记》的消极影响

遗憾的是,由于早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展的勘校工作缺乏足够的版本文献和精密的仪器设备去参阅各种缩影本,加之校勘的老专家们不可能对很多方言俚语都把握得精准到位,导致人文本《西游记》中讹误众多,进而产生了不小的消极影响。例如,在第16回中,唐僧对悟空说,“汝是个畏祸的,索之而必应其求可也。不然,则殒身灭命,皆起于此,事不小也。”<sup>[3]</sup>这里的逻辑显然有问题。“汝”是“你”,指的是猴子,而孙大圣绝非“畏祸”之辈,相反,他是个惹事从不嫌大的主,唐僧不可能对他说出这样的话,所以,这里的“汝”应该改作“如”。

再如,在第53回中,当猪八戒饮了子母河的水后,“渐渐肚子大了。用手摸时,似有血团肉块,不住的骨突骨突乱动。”“骨突”是形容水沸时的声音,放在这里肯定不合适。因为原整理人不熟悉淮海方言,所以不知道这里的“骨突”应改作“骨冗”,现代语可写作“咕容”,形容有东西在内部蠕动的样子,所以这两个词是两回事。人文本《西游记》中类似的讹误还有很多,这些讹误也产生了不少负面的文化影响和外译结果,这是小说阅读的历史性和局限性使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进步,这个版本问题必须得到解决。

另一方面,《西游记》中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神奇变幻的神魔世界、优美典雅的诗词和乡音独具的连云港地区方言使得这部古典文学作品体裁古色古香,内容纷繁庞杂,也加剧了英译工作的艰难。必须承认的是,金无足赤,詹纳尔和余国藩的两个全版英本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文化误译问题,从而导致了《西游记》文化传播的部分失真,并扭曲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客观上也对以讹传讹的现象起了推波助澜的负面作用。例如,他们将第7回的“双林”臆断为“两个树林”而不是“沙罗双树”,于是就简单译作令人摸不着头脑的“two trees”<sup>[4]</sup>或“twin trees”<sup>[5]</sup>。再如,他们把第34回的“爬躄”理解为爬来爬去的动作,所以就译为“crawl”,其实这个连云港人方言与“爬”没有任何关系,在这里它是“不甘就范”“来回挣扎”“拼命挣脱”的意思,试想一下逻辑,此时的孙悟空已被

妖精奇特的宝绳牢牢捆在柱子上,根本无法脱身,他还怎么爬?

毋庸置疑,文学中的文本误读和误译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很多时候是可以接受和欣赏的,但如果在特定文化背景下,它导致了文学翻译的失实、误导甚至歪曲,则可以用消极和错误来评判了。不可否认的是,《西游记》的英译本之所以远未产生人们所期待的反响,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人文本《西游记》中的大量讹误产生了很多争议、困惑和误读问题,进而以之为翻译底本的英译本也必然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再加上译者自身中国古典文学素养的不足,使得译本与原著在艺术上很难取得较高的相似性,也就不太可能引起英文读者的兴趣。

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文本《西游记》的消极影响极大地抵消了其积极影响,国内的学界早已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的存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是外国译者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的,尤其是对《西游记》这样的鸿学巨篇而言,书中无处不在的文化知识和民间方言、地区传统常使詹氏和余氏困惑不已,只能被动地进行拆字解读再直译、硬译,这必然会严重影响译文质量并引发文化的传播裂痕,由此带来英语译本在世界上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这严重地束缚了《西游记》在英语世界的传播,《西游记》的重译工作就必须尽快提上日程,而这项工作因为《最新整理校注本西游记》的出版发行成为了可能。

《西游记》成书背景离不开江苏连云港,以李洪甫为代表的连云港地方学者依据数十年的考证研究,在2009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历经数年,运用娴熟深厚的方言功底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原版基础上正本清源,择善而从,勘误纠错了10000余条,重新校刊完成了《最新整理校注本西游记》并由人民出版社于2013年10月出版,这是目前国内研究《西游记》最准确完善的权威版本。该书以明万历金陵世德堂刊本“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世本)和明刊《唐三藏西游释厄传》(朱本)中的唐僧家世为底本,参考、对照、校勘了其它现存的十几种明清版本,鲜明还原了《西游记》的连云港地域文化特质,并对可能产生文本误读进而导致文化误译的特色词做了有效的校注,为重新开展《西游记》的全球译介提供了良好的版本来源和文化基础。

## 二、《最新整理校注本西游记》对消除文化误读的价值蠡测

### (一)对事实性疏忽的勘误,恢复了事实的本真

人文本《西游记》中出现了大量的事实性疏忽,甚至连常识性的四海龙王的名称都搞得混乱不堪。四海龙王是中国神话中的重要神灵,四兄弟从大到小依次是东海龙王敖广,南海龙王敖钦,北海龙王敖顺,西海龙王敖闰,这种事实民间是得到广泛认知的。人文本《西游记》的第3回一开始写得很清楚,但接着冒出“北海龙王敖闰说,……西海龙王敖顺……”,紧接着又改作“西海龙王敖闰”,而在第43回又把西海龙王记作敖顺,写道,“敖顺即唤太子摩昂…看敖顺贤父子之情”。在第45回又提及龙王父子出手相助一事,写道,“行者又谢了敖顺”,这种明显的张冠李戴式讹误居然延续了400余年却从未得到统一修正,也算是

《西游记》传播中的一大疏忽。

“恨恨”(hèn)在《西游记》中的第15回、40回、91回等多次出现,表示凶狠的样子,在杂剧《二郎神醉锁神魔镜》中就有“恶恨恨寻对垒,咚咚鼓响似春雷”的用法,但人文本将该词改作了“恨恨”,显然忽略了这一事实,忘记了元明时期语言的习惯表达方式。

在第93回中,人文本《西游记》讲玉兔精故意将绣球“亲手抛在唐僧头上。唐僧着了一惊,把个毗卢帽子打歪,双手忙扶着那球”。试想,毗卢帽是绣有毗卢佛像的僧帽,是唐僧这样虔诚的高僧的制式装备甚至是生命的一部分,它被绣球打歪了,唐僧的第一反应怎么会去扶球呢?这当然不符合事实。唐僧肯定是下意识地去扶正僧帽,这才符合中国“正衣冠,明是非”的文化传统,所以应改作“双手忙扶着那帽”,才能自然地折射出圣僧的佛性。可见,人文本的这个疏忽背离了《西游记》的佛家特质。

## (二)对文化信息的勘误,还原了文化精髓

中国的儒释道文化博大精深,这在《西游记》中得到了充分而鲜明的体现,可惜的是,人文本《西游记》因为各种主客观原因,无意中遗失或扭曲了很多中国的文化信息,客观上会产生断章取义或指鹿为马的负面效应,这是必须要避免的。

在第37回中,《西游记》本义是想套用唐朝诗人李涉《题鹤林寺僧舍》的句子“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但人文本不知为何竟改成了“因过道院逢僧话”,这是典型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文化谬误。首先,这一回讲的是太子在宝林寺参拜佛像,和道院毫无瓜葛;其次,中国历史上佛道两派曾经长时间相仇相攻,仅唐朝就因为释道相争而发生过多次全国性的流血冲突,明代也曾为信佛还是信道而闹得一塌糊涂,因此在道院怎么可能遇见和尚还聊天呢?即使道士有请,和尚想去前也得三思而后行啊。这种风马牛不相及的文化歪曲是不应该出现在《西游记》这部文学巨著中的。

人文本《西游记》中的附录是关于唐僧家世的,其来源是乾隆朝6700字的清刻本,而《最新整理校注本西游记》则根据明万历朝9400字的朱本重新校订唐僧家世,其内容更详实,叙事更生动,主题更鲜明,文化更完整,其中一大亮点就是:人文本中“后来,殷小姐毕竟从容自尽”读来特别牵强突兀,清人为出于正统教化需要而进行改动的痕迹明显,这一改动几乎颠覆了《西游记》“大团圆”的主题意义,因为唐僧家世的素材原本也叫《团圆记》,从唐僧合家团圆一直到取经成功后的五圣成真,都应是服务于“团圆”这一备受民间喜爱的文化主题,正如殷丞相说,“今日此酒,取名叫做‘团圆酒’”(补录)。而如果殷小姐自尽,就会导致悲剧的结局,这与极少具有悲剧意识的中国传统小说创作手法背道而驰,所以,《最新整理校注本西游记》将唐僧之母自尽一事删去,彰显中国文化的多元型和包容性。要知道,在《西游记》成书的明末,由于小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以及汤显祖、冯梦龙、李贽、徐渭等的思想引导,民间社会对遭厄女

性的态度应该还是相对宽容和开明的,不会一定要置唐僧之母于死地,这种文化心态对吴承恩有相当的积极影响,也解放了《西游记》的创作思想。同理,《最新整理校注本西游记》在《补录》中比人文本多出了“江流和尚奋勇当先,杀进私衙”,正如孙悟空在取经路上也会对冥顽不化的盗贼大开杀戒一样,这似乎也有悖于清代严格遵守的“出家人不杀生”的教条,而面对杀父霸母的大奸大恶,连和尚都无法容忍,必先除之而后快,这也是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的。中国的少林寺自宋代就有僧兵的记载,就像在抗日战争中也有很多和尚加入了抗日队伍一样,这同样有教化意义,因为民间要求惩恶扬善的文化正义必须得到伸张,“手刃仇人”“报仇雪耻”更是深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骨髓,在此,唐僧的形象塑造得极为丰满,小说的文化视角也更宽广,和现代读者崇尚的社会精神也更吻合。

### (三)对方言讹误的纠错,弥补了《西游记》方言传播中的不确定性存在

众所周知,《西游记》成书背景地是连云港,其作者吴承恩在书中不可避免地会将地方方言记入故事情节中,由此形成了另外一条特殊的话语体系,这对任何异地的读者来说都是个极大的挑战和困难,《最新整理校注本西游记》对此类现象做了不少纠正和注释,通过以下一些典型例子可以看出小说的方言讹误也会误导读者反应。

在第6回孙悟空和二郎神恶斗时,大圣曾变成站在水中的“青庄”,人文本不明就里地将之改作罕见的“青鹞”,都是较凶猛的水鸟,但是差异甚大,鹞要小得多,长尾短腿小喙,站在水里恐怕会溺水的,而青庄更大,长喙长脖长腿黑毛垂尾,就是连云港海州地区土话中的“苍鹭”,现在当地人形容一个人又高又瘦时还会说,“像个青庄似的。”显然,“青庄”的现场逻辑才是合理有效的解读。

在第19回中,孙悟空对老高谈起猪八戒“替你巴家做活,又未曾害了你女儿”,这里的“巴(bā)家”被人文本改作“把家”,也是因为不了解连云港的地方方言所致。“巴家”是指一心一意为家忙活以赚取最大利益,不是把持家务的意思,这也是对猪八戒文化形象的合理刻画,可以避免一些不合理的阅读偏见。

另外,《补录》中明确讲述了人文本所没有提到的唐僧之父陈光蕊中状元前“去海州城内去买文房四宝。行至十字街头”,明确提及海州弘农县及明清时代的城镇之中四通集市的十字街,这显然也与作者的生平和行迹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也为进一步研究《西游记》文化乃至中国明清时期的民俗文化提供了一块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这是连云港地方文化的又一块瑰宝。

同样,《补录》中对殷小姐认子的描写情节完整,环环相扣,自然贴切,“殷小姐只见那大脚上无了一个大脚指头,先年托孤于金山寺法明长老出,故此咬下脚指为记。就在香囊内取出元咬下脚指,斗在那脚指上面,仍然安住,并无痕迹。”这段鲜明精彩的细节描写被人文本简单地改作“小姐叫他脱了鞋袜看时,那左脚上果然少了一个小指头”。二者相较,后者的叙事顿时黯然失色,文辞尽失,前后呼应断裂,整体上相形见绌。再者,“斗”(dòu)字现在还在连云港地区被广泛使用,表示严丝合缝地对接之意,再此,古小说的方言特质又一次闪闪发光,提



醒相关读者深切感受一把浓烈的乡音,说明文化的凝聚力足以超越任何的时空距离。

(四)对阅读难点的注释,增强了读者对《西游记》的理解

《最新整理校注本西游记》的整理工作看似只花了数年时间,实际上它浓缩了以李洪甫老师为代表的一批连云港本土学者数十年的考证、研究、勘误之精华,10000余条的勘误,平均每回100余条,在每回的正文后都附有针对阅读难点的注释。例如,在第1回后的第5条注释“帔(mǐ):头巾、带子;又读:wà,古通袜,此处可作袜”。这种注音式的注释可谓细致入微地增强了小说文本的导读性。第3回的第15条注释“聒噪(guō zào!):说话琐碎,声音喧闹,令人烦躁。江湖上打招呼用的习惯语。犹言‘打扰了,对不起’。多见于早期白话作品,泛指打扰,烦扰”。这种注释将常用语习惯交代得很清楚,可以帮助读者根据上下文来正确理解。第14回后的第13条注释“竖蜻蜓:一种杂戏,即倒立。其动作为头脚倒立,用双手支撑全身。”这种注释言简意赅,对名不见经传的古代民间游戏都进行了大致刻画,使读者一目了然。第21回后的第9条注释“忏(chàn):佛教指请求别人容忍宽恕。又指佛教、道教讽诵的一种经文”。这种简要的注释明白地讲解了佛教、道教知识,消除了读者可能会产生的疑惑。

《最新整理校注本西游记》中这种编排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像人文本《西游记》那样没有附加这些注释,再加上一定部分的讹误,即使不影响汉语的理解和英语的翻译,但它们终归要在一定程度上引发文化概念的歧义并影响英译结果,因为“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无论哪一位译者,都会受到各种主观或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绝对‘信’的译文不可能存在”。<sup>[6]</sup>

### 三、《最新整理校注本西游记》英译的可行性

《西游记》作为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翻译次数越多,越能体现出其旺盛的生命力,“重译是翻译实践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现象。从一定的意义上也可以说,重译对于促进翻译事业的发展,提高翻译的水平,是不可缺少的。”<sup>[7]</sup>更为重要的是,重译可以通过借鉴前人翻译的得与失,对译文的先前版本有错则改,做出精益求精的完善。

同时,《西游记》英译所面临的重大难题就是“文化差异”的问题,王佐良、谢天振、黄友义、孙致礼、刘必庆等诸位译家都一再强调这一点,“从表面上看,翻译做的工作形式上是翻译语言,其实翻译的是文化,翻译文化就必须对两种文化都理解。”<sup>[8]</sup>《西游记》中有较多具有浓重地方色彩的方言词,如“青庄”“虾婆”“妆个嗑虎”“地里鬼”“爬跽”“鸽个眼睛”“厮拖厮扯”“虾着腰”等等,这些词恐怕只有土生土长的连云港人才能准确地把握其中的意指并有可能做出传神的译果,这也是连云港本土的学者们从事该项翻译工作的独特优势,这说明“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各自的文化心态、阅读体验、互文资源、审美感知等等都有差距。有鉴于此,译者的跨文化意识和对审美差异的敏感度,无疑是至关重要

的。”<sup>[9]</sup>

詹纳尔和余国藩想当然地将原文第8回中的“便见龙王三宝”分别译成“The Dragon King and the Three Treasures can be seen”和“You’ll see the three jewels and the Dragon King”，这样一来，对于生搬硬套的逻辑，不要说英文读者，连有一定英文基础的中国读者都会表示怀疑。殊不知，此处的“龙王”并非腾云驾雾，负责下雨的四海龙王，而是佛教中龙树菩萨，“三宝”指的是佛教的佛、法、僧三宝，所以此句可译作“The three Buddhist treasures of Nāgārjuna can be perceived”。此类的误译问题在《西游记》英译版中还相当多，需要后人加以重视并利用各种主客观条件努力克服。

为了有效避免阅读和翻译过程中出现误读和误译问题，《最新整理校注本西游记》进行了认真地勘误和注释，为其英译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有了这些针对性的改进，重新解读和英译过程会比较容易摆脱很多不必要的文化羁绊和纠缠，不仅开展的进度会大大加快，文化存真的比例也将明显提升，从而促进世人对这部古典巨著实现跨时空、跨文化的视界融合，这是符合当前全球化文化交流的客观需要的。毕竟，“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当‘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破产，文化本身已出现某种难以摆脱的危机时，西方的一些有识之士便开始逐步认识到另一种文化（东方文化）的价值和精深内涵，因此弘扬东方文化并使之与西方文化得以进行平等的对话已成为翻译工作者的义不容辞的义务。”<sup>[10]</sup>

### 注释：

[1]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Inc. 2006, Volume 10, p. 113.

[2] 陈一白：《〈西游记〉西游记》，《东方早报》2013年5月12日。

[3] [明]吴承恩：《最新整理校注本西游记》，李洪甫校订，人民出版社，2013年10月，以下相关引文同出此书。

[4] Translated by W. J. F. Jenner: Journey to the West,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Beijing, 1993. 以下相关引文同出此书。

[5] Translated by Anthony C. Yu: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以下相关引文同出此书。

[6] [美国] Andre Lefevere: Translation History Cultur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 14.

[7] 罗国林：《文学名著刍议》，《中国翻译》1995年第2期。

[8] 鲍晓英：《中国文化“走出去”之译介模式探索——中国外文局副局长兼总编辑黄友义访谈录》，《中国翻译》2013年第5期。

[9] 孙艺凤：《翻译的距离》，《中国翻译》2013年第6期。

[10] 王宁：《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中国翻译》2000年第6期。

[责任编辑：弘 亭]